

习近平关于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论述研究

——兼论“十四五”我国“走出去”的政策着力点

□赵 瑾

习近平关于中国对外投资的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他系统回答了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依靠什么“走出去”?走到哪里去?如何“走进去”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面对“十四五”数字技术改变世界,新冠疫情大流行改变未来国际生产体系,投资保护主义、国际投资规则重塑等新挑战,学习习近平关于对外投资的重要论述,正确处理“引进来与走出去”、政府与市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竞争与合作、经济交流与人文交流、义与利、走出去与外援、发展与安全等十大关系,对谋划“十四五”我国“走出去”的重大思路和实现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中国对外投资;十大关系;“十四五”规划;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21)11—0005—09

DOI:10.16158/j.cnki.51-1312/f.2021.11.002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20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流量位居世界第一,存量达到2.3万亿美元,保持世界第三位。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什么能在较短时间内跻身全球投资大国行列,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虽有研究,但多局限于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企业行为研究,鲜有从“走出去”的国家战略高度,特别是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从习近平关于对外投资的一系列论述中开展系统、深层次的文本研究。我国已经开启“十四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面对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后国际投资大幅下降,全球供应链战略布局区域化、分散化、本土化调整,发达国家对华投资保护主义,国际投资规则重塑等新挑战,深入学习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走出去”的重要论述,对扎实推进“六稳”“六保”,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谋划“十四五”我国“走出去”的基本思路与重大举措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走出去”的目的:实现中国复兴梦与世界共同繁荣梦

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布局国际化生产,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对于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当代西方经典国际投资理论都是从企业微观层面分析。马克思国际投资理论揭示,资本输出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其目的是为了攫取高额利润,按“资本”与“实力”来瓜分世界。那么,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下,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

基金项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研究课题“新形势下‘走出去’基本思路与重大举措研究”

作者简介:赵瑾,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为何要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呢?

“走出去”战略是20世纪末党中央基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提出的国家重大战略。目的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国际竞争。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习近平从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中国与世界两个维度谋划“走出去”。从国内大局看,要实现中国梦,一要提升国家综合国力。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二要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努力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推动价值链从低端向中高端延伸,更深更广融入全球供给体系”,^{[1][307]}积极引领全球价值链重塑。三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参与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1][298]}从国际大局看,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世界共同繁荣发展,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二是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三是打造“一带一路”开放合作平台,通过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联动发展,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

二、“走出去”的优势:综合优势

在主流国际投资理论中,垄断优势或特定优势是跨国公司开展对外投资的前提。发达国家的企业主要基于其独特的技术优势、管理优势、国际营销渠道、知名品牌等优势开展对外投资。但近年来国际投资发展的现实表明,不具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也成为国际投资的新生力量,占比超过20%。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既有从技术规模和适用性等视角分析的小规模技术论、技术地方化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论,从经济发展阶段阐释的投资发展周期论,也有以要素获得为目的进行分析的投资诱发要素组合论等。那么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优势是什么?根据习近平关于“走出去”的重要论述,我国“走出去”依靠的是包括政治优势、地缘优势、经济优势等在内的综合优势。

(一)政治优势。习近平在与俄罗斯、东欧、巴基斯坦合作中多次谈到要将政治优势化为合作优势。在中俄合作中,他指出:“牢固的政治和战略互信是交流中俄关系最宝贵、最核心的价值,是双方开展各领域合作的独特优势。”^[2]在中国与东欧国家合作中,他强调:“中罗友好的政治优势是不断推进务实合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的建立为拓展中国同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中东欧国家的各领域合作搭建了新平台。”^[3]在中巴合作中,他指出:“中巴关系的最大特点是高度政治互信,凡事为对方着想,始终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4]依靠这种政治优势,中俄双方在经贸、能源、技术、人文、国际事务等各领域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巴基斯坦成为我国在南亚地区最大投资目的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二)地缘优势。我国对外投资存量的65%以上分布在亚洲。习近平高度重视周边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要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空间,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要加快沿边地区开放,深化沿边省区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5][298]}关于中亚合作,他指出:中国同中亚国家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我们要全面加强务实合作,将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6]

(三)经济互补优势。截至2020年底我国2.8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9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企业4.5万家。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是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通过优势互补,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1. 制造业大国的产业优势。中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份额的28%以上,连续十年全球第一。在中英合作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突出优势是处于全球产业链中游,高铁、核电、汽车等一大批产业和装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性价比高,符合很多国家需求和承接能力。中国愿同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把各自比较优势衔接起来,实现联动发展。”^[7]在中印合作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领域经验丰富,愿在这些领域为印度发展发挥作用。‘世界工厂’和‘世界办公室’的强强联合,将形成最具竞争力的生产基地、最具吸引力的消费市场。”^[8]

2. 资金优势。中国是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拥有庞大的金融系统(全球第一大银行系统、第二大股票市场、第三大债券市场),充裕的资金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对非援助上,为推动“八大行动”顺利实施,习近平提出:中国愿以政府援助、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融资等方式,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支持。在对俄远东地区合作上,“中方宣布设立总规模为1000亿元人民币的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用于促进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9]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设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

3. 技术优势。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并没有在技术上形成绝对优势。但十八大以来,创新发展战略实施成效显著,一些技术已经从过去的“跟跑”到“并跑”向“领跑”迈进,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轨道交通设备、通讯设备等产业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自主研发的复兴号高速列车、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等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习近平在会见太平洋岛屿国家时说:“中国有资金、技术、市场优势,双方要充分挖掘潜力,加强合作。中方愿意帮助萨摩亚发展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10]

4. 市场优势。中国拥有14亿人口,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7年,全球家庭消费增长的31%来自中国。习近平指出:“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中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增长潜力巨大。”^[11]在中德合作中,习近平指出:“中国需要‘德国质量’,德国发展离不开中国市场和‘中国速度’。”^[12]谈到中意合作,习近平指出:“中国将扩大对外开放,通过每年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方式,同包括意大利在内的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市场机遇。”^[13]

5. 产能优势。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巨大的产能优势。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习近平强调,要“整合欧洲先进技术优势、中国产能优势、波兰区位和人才优势,打造新的贸易中心和经济增长极。”^[14]在中国与阿联酋合作中提出,要“打造好哈利法港二期集装箱码头和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示范项目,巩固和扩大能源领域长期、稳定、全方位的战略合作。”^[15]在中非合作中,提出要“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八大行动’同南非政府未来五年行动计划对接,深化产能、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数字经济、高新技术等领域合作。”^[16]

6. 快速发展优势。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GDP增长33.5倍,年均增速高达9.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习近平强调,“中国速度和德国质量的联手,将为中欧乃至世界经济创造巨大增长空间。”^[17]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总之,“走出去”的国家不同,发挥本国优势的侧重点也各异。对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主要优势在于市场优势、相关产业的技术优势和经济快速发展优势;对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来说,我国主要是政治优势、地缘优势、制造业优势、产能优势、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

三、“走出去”的重点方向与重点领域:面向全球、各有侧重

“走出去”走到哪里去?如何利用好国际市场?习近平总书记的“走出去”思想致力于面向全球市场

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全面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但基于不同地区差异、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市场条件,合作也各有侧重。

(一)重点打造“一带一路”跨区域国际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建设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合作新平台。其理念是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目标是追求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原则是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合作重点是着力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主要面向亚欧非大陆,并向所有伙伴开放。但不同地区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也各异:东南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南亚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向和合作伙伴;中亚是重点合作地区和重要合作伙伴;阿拉伯国家是天然合作伙伴;欧洲是以构建亚欧大市场为目标,把中欧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结合起来。

(二)加强区域与跨区域国际合作

近年来多边贸易谈判受挫,但全球区域和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成效显著,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美墨加协议相继达成。习近平高度重视区域跨区域国际合作,并根据不同区域的发展特点,指明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1)亚太合作。旨在加强互联互通,推动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深化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合作,打造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蓝色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增长点,引领全球创新发展的方向。(2)中非合作。由侧重农业、工业、基础设施、金融、绿色发展、贸易投资便利化、减贫惠民、公共卫生、人文、和平与安全的十大合作,转向重点实施好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的“八大行动”。(3)中阿合作。侧重互联互通、海洋经济、能源合作、航天合作、金融合作、高新技术合作,以及加强双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制药、智慧城市等领域合作。

(三)积极推动中国与美、欧、日、俄双边合作

我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积极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发展与美欧日俄大国的经济合作,致力于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1)中美合作。中美经济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合作空间巨大。习近平提出,争取早日达成高水平的互利共赢的中美投资协定;拓展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促进中美双向留学,推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合作。(2)中欧合作。中方强调中欧要积极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其中,中英侧重开展中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同英国八大技术和战略产业的互利合作,联手开拓国际市场;中德侧重构筑数字化时代的中德关系,支持两国企业开展“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对接合作,在自动驾驶、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数字化和5G等新兴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培育和开拓未来市场;中法侧重推进两国在核能、航空、农业食品、经贸等各领域的合作。(3)中日合作。侧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一带一路”第三方合作,以及科技创新、服务业合作。(4)中俄合作。侧重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农业、旅游、金融等重点领域,创新、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特别是能源、核能、航空、航天、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战略性大项目合作。

四、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正确处理好十大关系

十八大以来,我国“走出去”步伐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世界排名已经从2002年的第25位提升到2020年的第3位。面对COVID-19全球大流行促使美欧推动重要战略产业回流,逆全球化回潮,西方大国立法对华投资实行严格的安全审查,“一带一路”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加大,“十四五”期间要确保中国在全球FDI的大国地位,促使中国企业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要正确处理以下十大关系。

第一,“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走出去”步伐加快,“引

进来”与“走出去”基本趋于平衡。但如何从量的平衡走向质的平衡,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体系下如何促进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彼此互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十四五”我国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习近平主张,一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他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已经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1]290}二要统筹“走出去”和“引进来”。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在国外,但根基在国内。开展合作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特别是要重视发挥国内经济的支撑辐射和引领带动作用。要统筹‘走出去’与‘引进来’……双向开放才能实现更好的利益融合。”^{[1]279}三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习近平提出要树立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我国与世界的发展,“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完善对外投资体制和政策,激发企业对外投资潜力,勇于并善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拓市场。”^{[1]294}

第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目前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比过半。近年来,美欧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国有企业执行国家战略,获得优惠贷款和政府补贴在国际市场上实行不公平竞争,并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走出去”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我国高水平开放要解决的重大难题。对此,习近平指出,“中国政府支持企业‘走出去’,但强调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中国政府的作用是为企业争取和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公平的制度框架。”^[7]“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要做好统筹协调工作,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类企业参与,同时发挥好政府作用。”^{[18]216}

第三,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关系。跨国公司是国际投资的主体,中小企业虽然投资金额小,但在投资项目数中占比较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在“走出去”过程中普遍面临融资难、投资风险、人才短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对此,习近平指出:“中小企业是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也是推动社会创新和创造大量就业的积极要素。两国政府要为中小企业合作创造有利条件,调动他们合作的积极性,使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同步发展、相互促进,并共同开拓第三国市场。”^[9]

第四,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近年来发达国家为确保本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垄断优势,相继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以国家安全为由实行投资保护主义。欧盟公布“欧盟外资审查新框架”提案、德国修订《对外经济法》、美国签署《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等,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断遭遇来自发达国家严格的投资审查与投资限制。习近平主张,一是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实现互利共赢。他指出:“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5]336}二是创新合作方式,实现共赢多赢。习近平指出,要“通过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多边合作等各种形式,把大家的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19]491}三是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习近平指出:对外投资遇到一些摩擦属于正常的营商范畴。“不能把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政治化,不要带着偏见看待中国企业。”^[7]要“加强协商交流,本着互利合作的态度,坚持以对话协商方式解决贸易和投资争端。”^[12]

第五,义与利的关系。马克思国际投资论指出,追逐高额垄断利润是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的本质。作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主义中国,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多次强调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在对非合作上,他指出:“中国相信中非合作的必由之路就是发挥各自优势……中国主张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张开怀抱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快车。”^[20]在中巴合作中,习近平指出:“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将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巴关系,将巴基斯坦置于中国外交优先位置……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帮助巴基斯坦就是帮助我们自己。”^[4]

第六,经济交流与人文交流的关系。与西方全球配置资源,实现高额垄断利润不同,习近平非常强

调人文交流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他说:“人文交流是软实力的体现,软实力强大了,开展政治、外交、经济活动的阻力就会小。”^{[18]220}我们要“深入开展教育、科学、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各领域人文合作,加强议会、政党、民间组织往来,密切妇女、青年、残疾人等群体交流,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11]

第七,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走出去”是生产要素的跨国转移,涉及资源、资金、技术、人员等海外利益安全,习近平强调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一是高度重视海外利益和投资风险问题。他指出:“要高度重视境外风险防范、完善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全面提高境外安全保障和应对风险能力。”^{[19]488}二是维护海外利益安全。他指出:国际安全形势很复杂,而我们在国际上基本是不设防的,也没有什么有效手段,“我们要加紧研究、加大投入、加强防范,逐步提高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保护海外我国公民和法人安全,保护我国海外金融、石油、矿产、海运和其他商业利益。”^{[1]299}三是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他提出:“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快完善安全发展体制机制,补齐相关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积极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21]四是积极推动区域、双边投资谈判,保护我国在国外的投资利益。在中美两国首脑会谈中,习近平提出:要“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双向贸易和投资健康发展。”^[22]

第八,中国与东道国的关系。“走出去”看似是企业的行为,本质上是国家关系,映射了投资母国与东道国的关系。在处理与各国关系的问题上,习近平始终坚持人民至上,造福人民。一是通过战略对接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习近平指出:“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5]331}在中意合作中,习近平提出:“把‘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同意大利‘北方港口建设计划’、‘投资意大利计划’等对接,在海上、陆地、航空、航天、文化等多个维度打造新时期的‘一带一路’。”^[13]二是不牺牲别国利益。习近平强调:“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强人所难、以邻为壑的事情,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5]249}三是重视经济利益的同时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他指出:“我国企业‘走出去’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遵守驻在国法律,承担更多社会责任。”^{[23]501}“为当地创造就业、增加税收,又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为当地社会发展作贡献。”^[12]

第九,“走出去”与援助的关系。中国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对外援助坚持授人以渔,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一是量力而为,加大对外援助的力度。习近平强调:“对外援助也要量力而为,讲究方式方法,不论什么援助项目,都要搞好前期调研工作,尽量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尽可能使当地民众受益。”^[24]二是坚持授人以渔,提高受援国能力。在中非合作中,中方承诺:“将实施五十个促进贸易援助项目,支持非洲改善内外贸易和投资软硬条件……支持非洲国家提高海关、质检、税务等执法能力,开展标准化和认证认可、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23]459}三是致力于民生援助项目。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方承诺:“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二十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十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实施一百个‘幸福家园’、一百个‘爱心助困’、一百个‘康复助医’等项目”^{[23]516}。

第十,“走出去”与支撑体系的关系。习近平高度重视支撑体系对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作用,提出了多层次的支撑保障体系。一是精神支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和平发展的精神支撑。二是智力支撑。“一带一路”建设要“智力先行”,要“加强人文领域合作,深入开展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领域合作,建立大数据交流平台,共同打造‘一带一路’智库合作网络。”^{[25]112}三是平台支撑。要“搭建更多贸易促进平台,深化生态、科技、文化、民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为全球提供开放合作的国际平台。”^{[19]205}四是资金支撑。即“打造多层次金融平台,建立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长期、稳

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23]505}五是机制保障。通过高峰论坛、联络机制、研究中心、促进中心、能力建设中心、合作联盟等方式,确保合作既有理念引领、行动跟进,也有机制保障。

五、习近平关于对外投资重要论述的理论创新

(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改革开放时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在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的重要理论成果。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大力引进外资的“引进来”,20世纪末,江泽民提出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走出去”,十七大胡锦涛强调将“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统筹“走出去”和“引进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习近平关于对外投资的重要论述不仅继承、丰富了该理论,而且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一带一路”新倡议,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动发展,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该理论,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为“十四五”和未来15年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关于对外投资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走出去”?依靠什么“走出去”?走到哪里去?如何“走进去”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与西方国家对外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攫取高额利润,按“资本”与“实力”瓜分世界不同,我国对外投资的目的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各国共同繁荣发展的世界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西方国家对外投资以战争、武力、极限施压等方式,迫使对方打开大门,实现赢者通吃、你输我赢的掠夺不同,我国对外投资对接各国发展规划和战略,通过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与西方国家对外投资造成东道国环境污染、价值链分工低端锁定、供应链断裂,甚至引发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不同,我国对外投资致力于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提升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和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民生改善。习近平关于对外投资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贡献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COVID-19大流行引发了世界经济深度危机、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凸显、国际社会分化。美国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东升西降”的变化,为维护其霸权地位,在西亚、亚太等地不断挑起事端,加剧全球紧张局势,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列宁也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资本家同盟共同瓜分世界,大国间以非和平方式重新瓜分世界是战争的根源。“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实践。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港口、铁路、公路、电力、航空等领域的投资合作,不仅提升了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建构基本形成,而且促进了东道国工业化进程。习近平关于对外投资的重要论述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伟大实践,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贡献。

六、“十四五”时期“走出去”的政策着力点

“十四五”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贯彻习近平关于对外投资的重要论述,规划“十四五”“走出去”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第一,实现“走出去”的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走出去”的规模无论是流量还是存量,均已进入全球

大国行列。但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体系下,如何统筹好“走出去”与“引进来”,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内外联动与良性互动,提高“走出去”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确保供应链、产业链的安全稳定,仍是困扰我国“走出去”的突出问题。实现“走出去”的高质量发展,一要加快建立“走出去”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评价体系。二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合作方式、坚持绿色投资、协调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统筹“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向开放、实现互利共赢。三要尽快建立有利于实现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

第二,构建“走出去”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是实现“走出去”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应建立以行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应完善海外投资法律制度、管理体制、促进体系、安全体系、支撑体系;提升海外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加快建立海外投资公共服务平台、国际交流对话平台;完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

第三,构建全方位海外安全防范体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境下,如何确保海外投资利益和人员安全,已成为“十四五”必须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为此,一要处理好与大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我国对外投资存量的60%以上分布在亚洲周边国家,10%以上集中在发达国家。其中,对发达国家投资的近70%集中在欧美。处理好与大国及周边国家关系,将为稳步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二要重启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落地生效,打破西方国家对华投资壁垒,建立维护我国海外利益的安全防线。三要积极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我国应充分发挥全球投资大国的作用,积极推动国际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四要加强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消除内在安全隐患。五要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完善境外分类分级监管体系、“一带一路”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体系。

第四,投资可持续发展目标。COVID-19全球大流行,国际生产出现产业回流的逆全球化、供应链缩短的区域化、供应链安全的多元化发展趋势。联合国投资改革的新行动计划已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国家投资政策框架和国际投资协定。顺应国际投资改革的发展大势,我国应构筑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政策,打造新的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体系,实现经济全球化再平衡。

第五,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加强海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布局。一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与“一带一路”对接,推动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良性循环。二是坚持绿色投资、绿色金融、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为一体的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网络安全,特别是疫情防控、数字平台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创新“数字丝绸之路”合作新亮点。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2]“我们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记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N].人民日报,2017-07-06(2).
- [3]习近平强调: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更多成果[N/OL].新华网,(2013-07-02)[2020-02-06].<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2048391>.
- [4]习近平在巴基斯坦议会发表重要演讲[N].人民日报,2015-04-22(1).
-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6]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09-08(03).
- [7]习近平.共同开启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黄金时代”为中欧关系全面推进注入新动力[N].人民日报,2015-10-19(1).

- [8]习近平在印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N].人民日报,2014-09-18(3).
- [9]习近平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N].人民日报,2017-07-04(2).
- [10]习近平会见一些太平洋岛国领导人[N].人民日报,2014-11-23(1).
- [11]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9-04-27(3).
- [12]把握中国机遇,实现共同发展——习近平出席中德工商界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4-03-31(1).
- [13]习近平.东西交往传佳话 中意友谊续新篇[N].人民日报,2019-03-21(3).
- [14]习近平同波兰总统杜达共同出席丝路国际论坛暨中波地方与经贸合作论坛开幕式[N].人民日报,2016-06-21(2).
- [15]习近平同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会谈[N].人民日报,2019-07-23(1).
- [16]习近平会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N].人民日报,2019-06-29(3).
- [17]习近平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署名文章 中德携手合作造福中欧和世界[N].人民日报,2014-03-29(2).
- [18]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1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0]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18-09-04(2).
- [21]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N].人民日报,2020-05-24(1).
- [22]习近平同特朗普开始举行中美元首会晤[N].人民日报,2017-04-08(1).
- [2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4]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C].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51.
- [25]习近平.习近平谈一带一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收稿日期:2021-06-25 责任编辑:赵爱清)

Research 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 --On the Policy Focus of China's "Going Out"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Zhao Jin

Abstract: Xi Jin-ping's exposition on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the period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He systematically answered why enterprises should "go out", what to rely on to "go out", where to go, how to "go in", and other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Facing new challenges such as digital technology changing the world, COVID-19 pandemic changing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ystem, investment protectionism, and the reshaping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s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learning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going out", and correctly handling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of "bringing in and going out", government and market, large enterprise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justice and profit, going out and foreign aid,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lanning the major thinking of China's "going out" and realizing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Key Words: Xi Jin-Ping;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The "14th Five-Year Pla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